

# 36年前国家交给他一个与阿富汗有关的任务，后来国家给忘了（二）



年轻时的车洪才先生

他异常兴奋，“因为派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多，而当时阿富汗还被划为资本主义国家，机会很少。”那时候他还不是党员，他觉得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。

刚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学什么语种，只是被使馆临时分了宿舍，宿舍里就有日后一起编词典的张敏。

最后决定的人随手一指，告诉他们：“你们这个宿舍的人学普什图语，另外的宿舍就学波斯语吧。”

他琢磨着国家派他来是为了取经，那就要尽快把经带回来。于是没休过寒暑假，花3年时间学了9个学期的课程，他觉得这是一个“历史使命”。

回国后他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（现

中国传媒大学）教语言，培养了两批学生，然后去了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，其间还被要求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成普什图语，“那时候国家对非通用语的需求非常大，我就被调来调去。”他说道。

1975年，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，准备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，其中就包括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》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辞书市场是一片荒地。截至1975年年初，书店中公开出售的中外文词典，仅有《新华字典》、《工农兵字典》和《袖珍英汉词典》等少数几种小型词典，收词也非常少。

“这是个非常光

荣的事情”，1978年商务印书馆把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》的编写工作交给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他，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，“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，我出国所学的就是为了这一天。”

同时参与编写的还包括他的助手——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的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，他们两人完全脱产编字典。老同学张敏则利用在国际台普什图语组工作的便利时常帮忙。

“我们那时候就有一股冲劲，想要把这个事做好。”张敏说。

车洪才刚接手词典，信心很足，他希望打造出中国第一本优质的普汉词典，“可以流传后世的那种”。他和宋强民都乐观地认为词典的完成会在“两三年之内”。

在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，他们把能找到的相关词典都摊在桌子上。宋强民以前学过木工，他给每本词典都做了个托架，方便阅读。车洪才则开始利用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纂，直接在上面用铅笔修改。

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经费。他们从国

际广播电台借了一台普什图语打字机，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，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。后来俩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于保存，宋强民就找到了当时西单二龙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家印刷厂，厂里有一些不用的下脚料，他拜托他们把这些纸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，于是就有了统一的格式：在15×10厘米的卡片上，先是普什图词语，然后是注音，下面是词性，最后是释义。

“小宋爸爸是戏剧学校的领导，小时候抄过戏文，所以他的字也写得很工整。那真是一丝不苟地写字。”车洪才感叹。

他们甚至考虑到了做好以后怎么印刷，在“文革”的时候外文印刷厂排过一本普什图语毛主席语录，有现成的刻好的铅字，直接就可以拿来用。

但好景不长，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，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政权，中阿关系陷入恶化。

他担心政策会有变化，但还是安慰编字典的同伴：“这个时候应该更需要这部词典，因为阿富汗的‘亲苏’身份使它成为更重要的调研对象。”

结果等了一段时

间，他发现没有人过问这件事。领导从没有来看过他们，同事除了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上见他一面，都搞不清他在做什么。只有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每隔大半年会打个电话过来，询问一下进度。

## 命运不受支配

编词典的工作繁琐而枯燥。他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，只能听见铅笔“沙沙”写字的声音。因为过度聚精会神，眼睛会很疼，“像针扎一样”。碰到生僻的词汇，有时候一上午也编不出几个。

车洪才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《李时珍》里的人物，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而没有尽头的采药工作，“编词典的时候看着外面的楼一天天上去，我就在想我们这速度怎么上不来？”

但在车洪才的夫人学平女士看来，他们的速度已经够惊人了，她经常去办公室发现俩人默不作声地一个译单词，一个抄卡片，满屋子纸片堆得都快把人埋起来了。她从不打扰他们，因为有一次她拍了一下车洪才的肩膀，结果他像触了电一样抖了几下，“太专注了”。